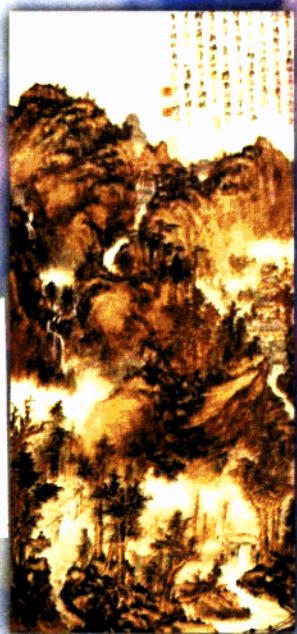


中国文学百家精品文库

王克俭 主编

89

林语堂散文选三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本丛书编委会

主 编:王克俭

副 主 编:邓先明

编写人员:简文 张哲生 成立君 王丽霞
王南 吴连根 孙凌曦 孙宾贺
张惠 张金方 邓先明 王克俭

策 划:北京汉洲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目 录

林语堂小传·····	(1)
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	(5)
论语丝文体·····	(7)
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	(13)
打狗释疑·····	(17)
粘指民族·····	(20)
读书的艺术·····	(21)
论读书·····	(28)
秋天的况味·····	(37)
谈言论自由·····	(39)
论文·····	(44)
我怎样买牙刷·····	(57)
论幽默·····	(63)
论西装·····	(78)
记春园琐事·····	(83)
恋爱和求婚·····	(87)
林语堂散文赏析·····	(91)

林语堂小传

林语堂，原名和乐，笔名语堂。1895年出生于福建省龙溪县(漳州府平和县)的坂仔村。父亲是个乡村牧师，为人热情爽快，机智幽默。他常爱给孩子们讲笑话，把他们逗得大笑不止。幼年的林语堂深受父亲幽默气质的感染。

林语堂6岁启蒙，由父亲在家教念诗、经书和古文。10岁，林语堂到鼓浪屿教会小学上学。

1908年，林语堂入厦门寻源书院。在这所教会学校里，他接触到西洋音乐，简直着了迷。还以一名基督教学校学生的身份参观了美国舰队，感受到西方进步的科学技术威力，刺激了他向西方学习的愿望。1912年他进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专攻英

文。热情甚高，竟全部停止对中文的研究。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他在清华学校当了3年英文教员，此时他感到大学期间中文学习的荒疏，又继续读了大量古文和古典小说。广泛的涉猎，为他以后的散文创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1919年，林语堂携新婚的妻子廖翠凤踏上出国的旅程，先后去美国的哈佛大学、德国的耶拿大学和莱比锡大学留学，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在留学期间，林语堂受到欧美的政治、哲学思想和文化思潮的影响，读了哥德、莎士比亚、海涅等外国作家的文学大量作品，对英国随笔的幽默和从容风格十分欣赏。这些对林语堂后来的政治观、文艺观和散文风格的建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1923年，林语堂同妻子登轮回国，历任北大、北师大、女师大教授。这年冬天，林语堂陆续写文章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最先提出把英文humour译成幽默，并提倡幽默，但在当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1924年，林语堂参加了以鲁迅为发起人之一的语丝社，成为《语丝》杂志的长期撰稿人之一。《语丝》以杂文为主，注重社会批评和思想批评，林语堂与鲁迅等语丝同人在对章士钊、研究系、现代评论派和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并肩携手、相互支援。共同形成了“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的“语丝文体”。后来，林语堂把《语丝》时期所写的文章结为《剪拂集》出版，展现了林语堂“浮躁凌厉”时代的战斗风貌。

1926年，北京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段祺瑞下野，政权落入另一军阀头子张宗昌手里，反动军阀残酷迫害进步知识分子，鲁迅、林语堂都被列入通缉名单之内。五月，林语堂

南下厦门，鲁迅为之送行。林语堂在厦大任教授、文科主任，并推动校方聘请鲁迅、孙伏园、沈兼士等来厦大执教。此间，鲁迅和林语堂的关系一直很密切。

1927年，林语堂带着“满以为中国的新日子已经曙现了”的梦想，应陈友仁之邀到武汉政府任外交部秘书。6个月的秘书生活，他目睹了蒋介石发动的4·12反革命政变、汪精卫的公开叛变革命，原有的梦想随着大革命的惨痛失败而破灭，情绪低落而消沉。对革命产生了一种厌倦情绪。他感慨于自己“少不更事的勇气”，“益发看见我自己目前的麻木与顽硬”。再也唤不起当年与旧军阀斗争时的意气，只是充满了对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太平人的寂寞与悲哀”。这种思想上的倒退，使得林语堂与鲁迅二人产生了根本分歧，以至最后分道扬镳。

从1932年起的三年时间里，林语堂先后创办了《论语》(1932)、《人间世》(1934)和《宇宙风》(1935)三种小品文半月刊，打着“幽默”的大旗，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以“闲适之笔调语出性灵”。出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林语堂办的刊物上既发表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一些左翼作家和著名政治活动家如宋庆龄、何香凝的作品，也登载过反共文章和嘲弄马列主义、讽刺左翼文学的文章。林语堂这时期写下大量散文，多发表在他自己主办的三种刊物上，后收集在《犬荒集》、《我的话》(《行素集》、《披荆集》)、《进行集》、《有不为斋文集》里。林语堂的散文，有些是把讽刺矛头指向国民党的当权者和他们的反动政策，有些是嘲讽左翼文学，而大量的是游戏消闲、轻松闲适的戏谑小品。鲁迅为了坚持“五四”以后的战斗传统，使小品文向健康的道

路发展，对林语堂的主张作了深刻的批评。认为林语堂的幽默，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的闲适小品，将“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明确提出小品文“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而非“‘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鲁迅这些批评在当时具有醒世的作用。

1936年林语堂移居美国从事英文著述，最初到美国时，写了一组《海外通信》寄给《宇宙风》发表，谈他在国外的生活和见闻。后专用英文写作，有著作36种，其中小说、文学传记10种，散文、杂文集9种，中国文学英译本7种，编、著学术著作10种。林语堂广博的知识，操英文写作之流利俏皮，使他的作品大受欢迎。《生活的艺术》一书在美国印行了40版以上，林语堂获得了“文化人中之龙凤”的盛誉，在国际文坛上产生了影响。

1947年，林语堂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艺术文学组长，带全家游历欧美各国。1965年应台湾中央社社长马星野之邀，撰写《无所不谈》专栏，4年间，用中文断断续续写了180多篇，后结集为《无所不谈合集》在台湾出版。1966年6月，林语堂自美返台定居，居室在台北近郊阳明山麓，与家乡景川遥遥相望，勾起了缕缕思乡之情，写下了一些优美的抒情散文。移居国外或在台湾居住时期的林语堂，始终站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对社会主义中国抱有很大隔膜，并且表现了反动立场。1967年，林语堂主持《当代汉英词典》的编译，于1972年完成。1975年列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之一，结果落选。1976年3月26日在香港逝世，享年81岁。

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

——纪念孙中山先生

记得一二月前报上载有一篇孙中山先生的谈话，他说“我现在病了，但是我性太急，就使不病，恐怕于善后会议，也不能有多大补助。”我觉得这话最能表现孙先生的性格，并且表现其与普通中国人性癖的不同。因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且孙先生之与众不同正在这“性”字上面，故使我感觉改造中国之万分困难。如鲁迅先生所云，今日救国在于一条迂谬渺茫的途径，即“思想革命”，此语诚是，然愿意以为今日救国与其说在“思想革命”，何如说在“性之改造”。这当然是比“思想革命”更难办到，更其迂谬而渺茫的途径。中国人今日之病固在思想，而尤在性癖，革一人之思想比较尚容易，欲使一情性慢性之人变为急性则殊不易。中国今日岂何尝无思想，无主义，特此所谓主义，纸上之主义，此所谓思想，亦纸上之思想而已，求一为思想主义而性急，为高尚理想而狂热而丧心病狂之人，求一轰轰烈烈非贯彻其主义不可，视其主义犹视其自身革命之人则不可得，有之则孙中山先生而已。难怪孙中山有“行之匪艰知之维艰”之学说。

若由历史上求去，性急者每每为中国人所虐待，乃至显的事实。中国也本来不喜欢性急，故子路早已得孔子“不得其死然”的诅咒。若屈原，若贾谊便略可为中国性急者之代表，尤其是贾谊，然贾谊也早有苏东坡之谄其短见。此乃中庸哲学及乐天知命道理之天然结果。徐先生的非中庸论诚是；

“听天任命和中庸的空气打不破，我国人的思想，永远没有进步的希望。”个人以为中庸哲学即中国人情性之结晶，中庸即无主义之别名，所谓乐天知命亦无异不愿奋斗之通称。中国最讲求的是“立身安命”的道理，诚以命不肯安，则身无以立，惟身既立，即平素所抱主义已抛弃于九霄之外矣。中国人之情性既得此中庸哲学之美名为掩护，遂使有一二急性之人亦步步为所吸收融化（可谓之中庸化）而国中稍有急性之人乃绝不易得。及全国既被了中庸化而今日国中衰颓不振之现象成矣。即以留学生而论，其初回国时大都皆带一点洋鬼子之急躁性，以是洋气洋癖，时露头面，亦不免为同事者所觑笑，视为不识时务。由是乎时久日渐少有不变为识时务及见世面之时贤。及其时务已识，世面已见，中庸不偏之工夫练到，乐天知命之学理精通，而官运亨通名流之资格成矣。

我觉得孙中山先生性格不大像中国人，是指孙中山先生不像现代的中国人。至于孙中山先生能不能像将来的中国人，这便是吾人今日教育之最大问题。果使孙中山是像将来的中国人，那末我们也可不必为将来的中国担忧了。要使孙中山先生像将来的中国人，换言之，要使现代情性充盈的中国人变成有点急性的中国人是看我们能不能现代激成一个超乎“思想革命”而上的“精神复兴”运动。

岂明先生已经说过“照现在这样做下去。不但民国不会实现，连中华也颇危险……‘心所为危不敢不告’希望大家注意”诚然应希望大家注意。

提倡“精神复兴”我觉得是今日言论界最重要的工作。

论语丝文体

岂明先生在《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一文中说起《语丝》的缘起，并把《语丝》的特色精神表白的剀切详尽，使一班读者借此可以明白《语丝》的性质，并且使《语丝》自己的朋友也自己知道《语丝》之所以为贵。这虽然有点似乎自夸，但是总比以何种目标，何种“使命”自豪的机关报胜一筹，因为《语丝》始终就没有什么“使命”。《语丝》只是（如岂明先生所说）“我们这一班不伦不类的人借此发表不伦不类的文章与思想的东西。”所以有时忽而谈《生活之艺术》，有时忽而谈“女子心理”，忽又谈到孙中山主义，忽又谈到胡须与牙齿，各人要说什么便说什么。但是他的宝贵就在这一点。“办一个小小周刊，不用别人的钱，不说别人的话”，要表白得比岂明的话更确当实在不容易，除非我还可以补一句，就是“甚至于不用自己的钱”，这一点并不十分容易，若是合以上二条观之。但是那篇里头还有几句话很可以值得注意，很意味的——“大家要说什么都是随意，唯一条件是大胆与诚意，或如洋绅士所高唱的所谓‘费厄泼赖’（fairplay）”。这句话引起我一些意思，不妨来插说几句，或者也不仅以关于《语丝》的文体为限。

“不说别人的话”即有“诚意”，这就不容易，我想凡能与此条件相符的，有真正诚意的人，他的言论都是有益于世，即使其人的思想十分的“浑弹”我个人还是相信其有益。也许有人以为若江亢虎章士钊一流人如此其“浑”如此其“弹”蔑以加矣的复辟崇孔一类的思想，即使加以“诚意”条件，难道还是有益吗？但是一细想，这问题又未免太理想了。章士钊，江亢虎之流根本就没有所谓思想，更提不到思想之诚意不诚意。昨天在英文《导报》发见江亢虎对西洋绅士讲书经，初看时未免惊异，但是以为学术原与政见无关，江参政于复辟之余未尝不可以随便讲学，后来一拜读，什么二帝三王之德政略，尧舜政治为世界最古之民主政治略，《书经》的文是最好的文范略，“文明”即“文学之明”略，“文以载道”略都来了，甚至于今古文篇数且分不清楚，于是乃恍然大悟政治思想不清的人要叫他于学术有清晰的思想“压根儿”（借用玄同语）就没有这回事。思想不清的人，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思想，自然没有所谓“诚意”，自然不会“不说别人的话”。至于思想本非不清的人，却仍旧可以乏诚意，这是我们所谓“文妖”。近来观察一些名流的议论，有文存的及无文存的，使我渐渐越发相信吴稚晖的《野蛮文学论》。尽管你的笔墨如何高明，尽管你的文存文集如何风行一时，尽管你什么主义唱的高入云际，一察其人的行径，又是其文足道，其人不足观（惭愧的很，我就是曾经佩服过《甲寅》文字的一个人）这就是其文章未尝包藏着诚意的思想——此非野蛮文

学而何？何况徒以文字行一时者岂独《甲寅》一家而已！

二

野蛮文学而外，还有一种思想的蠹贼根本不能“不说别人的话”的，就是一种自号为中和稳健，主持公论的报纸。世界上本没有“公论”这样东西，凡是诚意的思想，只要是自己的，都是偏论，“偏见”。若怕讲偏见的人，我们可以决定那人的思想没有可研究的价值；没有“偏见”的人也就根本没有同我们谈话的资格。因为他所谈的“公论”都是一种他人的议论调和而成的，“甲方固然有几分是处，乙方又何尝绝无理由。”其实这种人又何必出来说话，除非以为既身居于文人学子之列不能不照例出来说几句，完全为面子关系，所谓“中和”者以此，所谓“稳健”者亦以此，并没有什么希奇。我们每每看这种人及这种报的自号中和，实益以见其肉麻，惟有加以思想之蠹贼的尊号，处之与“耗子，痲虫，鳄鱼”同列而已。因为我们宁愿看张勋的复辟，而不愿看段祺瑞之誓师马厂，宁愿见金梁的阴谋奏摺而不愿闻江亢虎的社会主义宣传，宁愿与安福系空拳奋斗而不愿打研究系的嘴巴，于政治如此，于思想界亦如此。因为最可怕的就是这种稳健派的议论，他们自身既无贯澈诚意的主张，又能观望形势与世推移，在两方面主张之中谋保其独立的存在，“年年姐姐十八岁”其实只是思想之蠹贼而已。因为虎狼猛兽我们可以扑灭，蠹贼，狐狸，耗子，痲虫我们却是无法提防。所以张勋可以一蹶不振，段祺瑞却反要变为民国功人，安福派可一攻则破，而研究系却仍旧可以把握政权。我们听张勋的大谈复辟尚觉

得其有些人气，若说段祺瑞张起捧张冯起捧冯，忽而命孙督苏忽而命郭督奉的执政府，实在无聊已极无话可说，简直与苏扬妓女的倚门卖笑伎俩无异，分不出谁是娼妇谁是政府。其实政界如此，言论界亦如此，野鸡生涯实不限于野鸡也。我们听折中稳健派的谈复古，还不得觉得怎么样，因为他们本不足惜，若是听他们也来讲革命二字却免不了要不胜肉麻之至。

三

以上因为谈“偏见”之重要，及人之不可无偏见夹叙些不相干的话，实则因为要有强毅贯彻偏见的人并非易易，但是同时我们要承认惟有偏见乃是我们个人所有的思想，别的一些都是贩卖，借光，挪用的东西。凡人只要能把自己的偏见充分的诚意的表示都是有价值，且其价值必远在以调和折中为能事的报纸之上。所以我主张《语丝》绝对不要来做“主持公论”这种无聊的事体，《语丝》的朋友只好用此做充分表示其“私论”“私见”的机关。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绝对要打破“学者尊严”的脸孔，因为我们相信真理是第一，学者尊严不尊严是不相干的事。即以骂人一端而论，只要讲题目对象有没有该骂的性质，不必问骂者尊严不尊严，等要派代表赴赛会时再挑一位尊严学者不迟。数月前曾经拜读某名流批评近来论坛的肤浅鄙薄或者就是指没有学者态度而言。个人觉得学者态度与“绝不生气”的中庸主义是分不清楚的。

Taine 曾经问得好，倘是我们发见吾侪同类中有一条“鳄鱼”（此乃 Taine 的“鳄鱼”，广义的，非吴稚晖的“鳄鱼”，狹

义的)历史家的责任是不是要单取学者科学的态度来充分描写颂扬他,还是要不要下一个评判,要不要骂他?个人以为骂人不骂人全在其人(一)有没有感觉非骂不可的神感,(二)敢不敢骂。因为大家公认,骂本有相当的用处,世界绝对没有人不承认奸臣是该骂的,或者不承认背义弃信的朋友,不贞之妇,不孝之子是该骂的,但是我们觉得骂不贞操的思想家似乎比骂不贞操的妇女更加重要,所以唯一的问题是骂之范围与定义而已,有人觉得段祺瑞章士钊该骂,有的便觉得他们情有可原。此见仁见智,本不能相迫。若以为章士钊很好,段祺瑞很好,也就让他很好。大概所以不骂的人,原因都是因为它们觉得样样都很好很满意的。我前曾经同一位留学生谈话,那时在曹锟时代,因顺便讲到我们还得革命一次,忽然把他吓得非同小可,这回同他又谈到段祺瑞,说起一些不敬的话,也弄得他不大肯回答我。所以骂与不骂全在其人,愈有锐敏的思想的人,他以为该骂的对象愈多,有感到骂人的神感的人,自然也同时感到骂人的神圣。自有史以来,有重要影响于思想界的人都有骂人的本能及感觉其神圣,当耶稣大闹耶路撒冷圣殿怒鞭兑换商时,简直与鲁智深大闹瓦官寺一样,并没有什么学者态度可言。所以尼采不得不骂现代欧人,萧伯纳不得不骂英人,鲁迅不得不骂东方文明,这都是因为其感觉之锐敏迥异常人所致,所以骂人之重要及难能可贵也就不用了,若有人以为吴稚晖骂章士钊便是失了学者尊严,吴稚晖只能回答:谁要你的野蛮学者的尊严!这也是可与以上所说偏见之重要的话联合起来,凡有独立思想,有诚意私见的人都免不了多少要涉及骂人。我们若读过 H. G. Wells, Shaw, Mark Twain 骂人的文章也就知道骂人之难

能可贵，他们那种怒气做来的文章，读起来真可使我们生气勇气，并不像学者所做无人气的文章一样。所以我说，骂人本无妨，只要骂的妙。何况以功能言之，有艺术的骂比无生气的批评效力大得多。即以文学革命而言，虽然是胡适之平心静气理论之功，也未始非陈独秀“四十二生的大炮”及钱玄同谩骂“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以与十八妖魔宣战之力。由是观之，骂人之不可以已明矣。

四

所以说第一只是没有感觉骂人之必要，第二是不敢骂人，这两种是不骂人之真因，与学者态度无涉，除非学者都是一些甄无畏蒋士都先生，所以要骂不骂似在于人，只要骂的有艺术，此外于《语丝》并不应有何条件限制。再有一件就是岂明所谓“费厄泼赖”。此种“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好努力鼓励，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到“费厄”惟有所谓不肯“下井投石”即带有此义。骂人的人却不可没有这一样的条件。能骂人，也须能挨骂。且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即使仪哥儿，我们一闻他有了痼病，倘有《语丝》的朋友要写一封公开的信慰问他，我也是很赞成的。大概中国人的“忠厚”就略有费厄泼赖之意，惟费厄泼赖决不能以“忠厚”二字了结他。此种健全的作战精神，是“人”应有的，大概是健全民族的一种天然现象。不可不积极提倡。

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

今日是星期日，稍得闲暇，很想拿起笔来，写我这三天心里的沉痛，但只不知从何说起。因为三天以来，每日总是昏头昏脑的，表面上奔走办公，少有静默之暇，思索一下，但是暗地里已觉得是经过我有生以来最哀恸的一种经验；或者一部分是因为我觉得刘杨二女士之死，是在我们最痛恨之敌人手下，是代表我们死的，一部分是因为我暗中已感觉亡国之隐痛，女士为亡国遭难，自秋瑾以来，这回算是第一次，而一部分是因为自我到女师大教书及办事以来，刘女士是我最熟识而最佩服嘉许的学生之一（杨女士虽比较不深知，也记得见过几回面），合此种种理由使我觉得二女士之死不尽像单纯的本校的损失，而像是个人的损失。

三月十八日即她死的早晨八时许，我还得了刘女士的电话，以学生自治会名义请我准停课一天，因为她说恐怕开会须十一时才能开成，此后又恐怕还有游行，下午一时大家赶不回来。我知道爱国运动，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素来最热烈参加的，并非一班思想茅塞之女界所可比，又此回国民大会，纯为对外，绝无危险，自应照准，还告诉她以后凡有请停课事件，请从早接洽，以便通知教员，不知道这就是同她说话的末一次了。到下午二时我因要开会到校，一闻耗即刻同许季葦先生到国务院，而进门开棺头一个已是刘女士之尸身，计前后相距不过三数小时。闭目一想，声影犹存，早晨她热心

国事的神情犹可涌现吾想象间，但是她已经弃我们而长逝了。

刘女士是全校同学钦爱的领袖，因为她的为人之和顺，及对于校事之热心，是全校同学异口同声所称赞的。功课上面，是很用工，是很想自求进益的一个人，看见他的笔记的人大都可以赞同，而且关于公益事宜尤其是克己耐苦，能干有为，是称为中国新女子而无愧。我本知她是很有希望的一个人才，但是还不十分知道底细，到许季葦先生对我详述，才知道她是十分精干办事灵敏的女子。上回女师大被章刘摧残，所以能坚持抵抗，百折不挠而有今日者，实一大部分是刘女士之功，可称为全校革命之领袖。处我们现今昏天黑地，国亡无日，政治社会思想都须根本改造的时期，这种热心有为，能为女权运动领袖的才干，是何等的稀少，何等的宝贵！

记得有一天很冰冷的晚上，到十时，刘女士才独自一人提了一个极大的皮箱来我家里。这是两月前女师大演剧的第二天，是为还借用的衣服来的。因为到各家去分还，所以跑到这里来已经时候很晚而十分疲倦了，但是她还是说“不累”，仍旧笑容的谈到前夜演剧的情况，个人的劬劳，好像全不在心上。我方明白女师大之所以能有奋斗到底的成绩，是因为有这种人才。

在我的书桌上，有一本刘女士的英文作文簿，是她死的前一日交来的，一直到现在总是不忍翻开看。今天毅然开看，最后一篇的题目是：

Social Life in the College 后记 Mar. 16, 1926，就是她死前二天做的。刘女士每对自己的英文懊悔程度太差，以前旷课太多，其实一看她的英文倒是很流畅通顺的。这一篇文中有很可引起我们感叹之语。很可以使我们知道她求学的心切，